

经典

# 阿摩司·奥兹《地下室里的黑豹》: 建构历史与现实象征联系的少年故事

□钟志清



阿摩司·奥兹,当代以色列文坛杰出作家,也是富有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代表作品有《我的米海尔》《爱与黑暗的故事》《恶意之山》等。

阿摩司·奥兹应该是时至目前中国学术界、创作界最为熟悉的以色列希伯来语作家。

《地下室里的黑豹》是一篇记忆小说,其希伯来文版首发于1995年。它以作家的童年经历为基础,又融进了丰富的文学想象。用作家本人的话说,故事本身来自黑暗,稍作徘徊,又归于黑暗。在记忆中融进了痛苦、欢笑、悔恨和惊奇。

小说的背景设置于1947年夏天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的最后阶段。那是巴勒斯坦历史上非常寻常的时期,因为数月后,即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将在纽约成功宣布巴勒斯坦分治协议,允许第二年在巴勒斯坦建立两个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家,一个犹太国家。英国人很快就会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离开那片土地。以色列国会将建立,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从此陷于无休止的冲突之中。在历史巨变的前夜,英国士兵、犹太人的地下组织、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纷纷行动:枪击、爆炸、宵禁、搜查、逮捕、迫在眉睫的战争与种种可怕的谣传不但给人们的日常生活添了许多不安定因素,也留

下了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谜团。曾在《我的米海尔》《恶意之山》(中译本名为《天使山庄》)和《爱与黑暗的故事》等作品中对这一历史进程做过不同程度触及与把握的奥兹,再次以这个特殊而复杂的历史时期为背景,借助奇巧的构思、睿智的分析,优美的行文,在《地下室里的黑豹》中触及了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

小说主人公首先以成年人的口吻交代“在我一生中,有许多次被人叫做叛徒”,给读者留下了悬念。随之回忆起自己在12岁那年因为与当时犹太人的敌对方英国人交往,第一次被称作叛徒的情形。小说的主要情节在家、东宫和特里阿佐林三个主要场景中展开。

奥兹素以破解家庭生活之谜见长。他在《地下室里的黑豹》中,再次运用爸爸、妈妈、孩子三个人物构成了家这个场景的核心:爸爸、妈妈来自乌克兰,他们的亲人全死于希特勒之手,这一点显然与奥兹本人的经历有别。爸爸是学者,性格中理性占了上风,“他讲原则,为人热情,对正义忠贞不渝”,具有强烈的仇欧情绪;而妈妈则喜欢追忆过去,故乡乌克兰的河湾,河面上星星点点的鸭群、缓缓漂流的蓝色百叶窗、河流和草地、森林和田野、茅草屋顶和薄雾中悠扬的钟声令她魂牵梦萦。熟悉奥兹的读者往往会觉得这一切似曾相识,但此次,作家的关注点有所转移,读者在《爱与黑暗的故事》《我们的米海尔》和其他作品中看到的家庭悲剧和夫妻情感均被放置到了边缘地位,孩子则成了家的中心人物,也成为整部作品的主人公。他在家中见证的不再是父母痛苦而缺少生气的日常生活,而是他们颇有几分让人憧憬甚至惊心动魄的地下活动,亲临了英国士兵前来搜查时的紧张局面。几乎所有情节的设置,都与孩子的所谓“背叛”行为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这个孩子年仅12岁,他因酷爱词语而赢得“普罗菲”(希伯来语中“教授”的缩写),说话方式与众不同,喜欢写诗拿给女孩子看。由于在家中受参加地下抗英活动的父母影响,在学校和其他场合听成人进行民族主义宣传“我们生活在一个生死攸关的时期”,“希伯来

民族要经受考验”,他立志为民族的事业而战。他提议创办了“霍姆”(希伯来语意为“自由还是死亡”)秘密组织,加盟这个组织的还有他的两个小伙伴本·胡尔和奇塔。他们想用旧冰箱里拆下的马达等材料制造火箭,打到英国的白金汉宫,把英国人赶出他们心目中的犹太人领土。他们还喜欢看好莱坞影片,模仿里面的英雄人物。普罗菲本人更是为影片中的英雄着迷,经常把自己比喻为“地下室里的黑豹”,意思是等待时机猛扑出去,为自己所谓的信念而献身。

但是,他的英雄梦屡屡受挫。在一个宵禁的夜晚,他被一个英国警察所救。这个英国人来自坎特伯雷,讲《圣经》希伯来语,崇拜古老的犹太文化,热爱耶路撒冷。普罗菲深受英国人的吸引,答应与他换课(相互学习英文和希伯来文),甚至天真地想借此机会,向英国警察套取情报,完成他所谓的民族主义理想。但事与愿违,小伙伴把他叫做叛徒,而他自己也无法确定自己与英国人的交往是否属于背叛行径,经常陷入灵魂的挣扎中。

围绕什么是“叛徒”问题的讨论首先是在小主人公的家中进行的。某天早晨,家中墙壁上赫然出现了“普罗菲是卑鄙的叛徒”几个黑体字。爸爸认为“叛徒”是一个没有廉耻的人。一个偷偷地,为了得某种值得怀疑的好处、暗地里帮助敌人,做有损自己民族的事或伤害家人和朋友的人。他比杀人犯还要卑鄙”。而妈妈则认为“一个会爱的人不是叛徒”。父母的不同观点成为支撑普罗菲理解叛徒意义的两个支点。他自己也试图通过翻阅百科全书,弄清楚叛徒的诸多字面含义。他甚至对着镜子盘问自己究竟长着一副叛徒的模样,还是地下室里黑豹的模样。

小说的第二个场景是东宫。名曰东宫,实为摇摇欲坠的棚屋,掩映在西番莲中。这是普罗菲和英国警察邓洛普军士换课并且交谈的地方。普罗菲在和英国警察交往时内心矛盾重重。尽管他不断提醒自己,一刻没有忘记英国人是敌人,不告诉对方自己的姓名,像地下战士那样称自己是“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人”,有时为赢得对方信任才喝下他买的柠檬汽水,有时却不由自主地告诉对方,爸爸



也懂拉丁语和希腊语,甚至对英国警察产生了某种“喜爱”的情感,随即又为自己的行为懊悔不已:“我的心在胸膛里跳动,犹如一只地下室里的黑豹。我以前从未做过如此杰出的益事,也许以后也不会了,然而几乎与此同时,我嘴里尝到了酸味,卑鄙叛徒的可耻滋味:如同粉笔刮蹭时的战栗。”故事的第三个场景特里阿佐林是普罗菲和“霍姆”组织成员开会、请求批准他执行刺探人物的地方,也是他因犯有所谓的叛变罪而接受审判的地方。普罗菲的两个小伙伴本·胡尔和奇塔模仿美国影片对他进行了持续不到一刻钟的审判,既严肃又滑稽,颇具黑色幽默的味道。一脸狐相的本·胡尔得出结论:“本庭相信叛徒所说他从敌人那里得到了一些情报。本庭甚至接受叛徒没有把我们泄露出去的说法。对叛徒所说他从未从敌人那里得到任何报酬的错误证词,本庭表示概慨并予以驳回:叛徒收了薄脆饼干、柠檬汽水、香肠肉卷、英语课本、一本包括《新约》在内的《圣经》,《新约》攻击我们的民族。”普罗菲找理由为自己辩解,但无济于事,他一气之下宣布解散自己创建的地下组织,与朋友们彻底决裂。表面看来,小说在写少年故事,实际则是把个人命运和共同体前途放在一起

来探讨个体身份,显示出作品的道德深意和作家的矛盾心态。作为一个希伯来孩子,普罗菲也和当时的多数犹太人一样,把英国人当成敌人,其人生致力于驱逐外国压迫者,但其灵魂又受压迫者困扰,因为这个压迫者也来自拥有河流与森林的土地,那里钟楼骄傲的耸立,风标平静地在屋顶上旋转。在和英国警察交往时,他很快便被其吸引了,甚至“具有一种冲动,要跑去给他拿杯水”。某种程度上,审判他的伙伴对他的背叛指控并非子虚乌有:“你普罗菲爱敌人……爱敌人乃叛变之最,普罗菲。”从某种意义上,小主人公已经背叛了20世纪40年代晚期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心目中约定俗成的价值标准。在他看来,世上有非自私、非精心策划的背叛,也有不卑鄙的叛徒。背叛者爱他正在背叛着的人,因为没有爱就没有背叛。这些富有哲理的话语揭示出仇英背后的荒谬与非理性狂热。

理智与情感、理想与现实、使命与道义、民族情感与人文主义准则等诸多充满悖论色彩的问题不但令小主人公费解,也让他成为成人的作家无法释怀。“直到今天,我仍无法向自己解释那是怎么回事。”在作家开始创作《地下室里的黑豹》的1994年,英国人已经不再是犹太人的敌人,传说中与犹太人具有血亲关系的以实马利的后裔阿拉伯人会成为他们的新敌。作品中写道,人们会为旧日生活在那里的迦南人——指阿拉伯人——感到难过。“犹太人会崛起,打败他们的敌人,石造村庄会毁于一旦,田野和花园将会有狼与狐狸出没的地方,水井将会有干枯,农夫、村民、拾橄榄的、修剪桑树的、牧羊人、放牧的都将会被赶进荒野。”

英国警察这样说。犹太女孩雅德娜也这样说:“即便真的是别无选择,你必须去战斗,地下工作者也是极有害的。此外,那些英国人也许很快就会卷铺盖回家。我只希望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别后悔、痛悔。”雅德娜是小主人公暗恋的一个姑娘,比他大8岁。他曾经无意间在屋顶看到雅德娜换衣服,事后一直伺机想请对方原谅,但又羞于启齿,经常为此懊恼不已。小说由此引发另一个层面的精神探索,即一个男孩在成长过程中的心

理期待问题。雅德娜的话与英国警察的说法具有某种关联,就像作家所说:“这些话酷似邓洛普军士所说的,阿拉伯人是弱方,很快他们就会变成新的犹太人。”这些讨论触及到了英国人走后巴勒斯坦何去何从的问题,预见到未来的潜在危险。普罗菲生雅德娜的气,认为雅德娜说出了最好秘而不宣的东西;他也生自己的气,因为他没有看出这种关联。在某种程度上,雅德娜有点像他的精神导师,他向她倾诉自己所有的问题与困惑,而她则告诉他从父母和老师那里均无法得到答案。“你跟我说的那个军士,似乎真的很好,他竟然连孩子都喜欢,但我认为你不会有危险。”喜欢孩子的人懂得爱,会爱的人不会背叛。也许,这种幼年时期的心灵触动是日后形成作家的人道主义情怀的一个诱因吧。

理想主义者希望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和平相处,但两个世界中的极端主义人士对此竭力反对。1993年,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在挪威达成了《奥斯陆协议》。天真的人们曾一度以为巴以和平在即,但两年后拉宾倒在了犹太极端主义者的枪下,巴以双方冲突再起,和平再度遥遥无期。一向主张巴以和平的奥兹因在1994年攻击犹太定居点的极端主义分子,也被右翼人称作叛徒,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小说的开头相呼应。浮现普罗菲脑海里的那幅画面:爸爸、妈妈和邓洛普军士在安息日清茶一盏,共话双方感兴趣的话题,雅德娜在吹竖笛,而“我”躺在她脚边的地毯上,地下室里一只幸福的黑豹,迄今依然可以说作家心目中的一个美好梦想。从这个意义上,《地下室里的黑豹》用形象的笔法表达了作家的人生理想,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构了一种象征性的联系,对本民族信仰深处某种极端性因素发出了危险信号。

当然,小说的动人之处不只在其意蕴,也在其行文、肌理与格调。英国警察离去后给主人公心灵深处留下的永远的痛,母亲故事中那不知漂向何方的蓝色百叶窗,声声竖笛中缓缓重现在记忆中的一个个故人、一件件旧事,使人会在掩卷时慨叹,这就是奥兹!

## 莫迪,画坛的凄迷残酷

□沈大力



莫迪格里阿尼《让娜·艾布泰勒纳肖像》

我初见意大利画家莫迪格里阿尼的作品,要远溯到32年前在巴黎教科文组织总部工作时,觉得那是波德莱尔莳养的一朵朵病态花,属于魏尔伦的“颓废派”。龚古尔文学院院士罗布莱斯称他“莫迪”,正像他习惯呼罗布丽姬塔“罗洛”一样。罗氏说“莫迪”生时落拓潦倒不堪,画卖不出去,愤懑之下仍扔进了水沟。我曾跟罗氏漫步到蒙巴纳斯的“穹顶”咖啡馆,他追述“莫迪”曾在此地的露天座无人赏识,竟至求人买画,每幅仅售5法郎,也难有人问津。此一时,彼一时,“莫迪”死后,人们竞相在他的故乡利沃诺港争掳逝者当年绝望抛进河水中的美女雕像。2011年,莫迪格里阿尼的一幅画竟拍出5000万欧元,折合近5亿人民币的高价,使他一举成为作品最昂贵的画家。今昔对比,真是天壤之别。

迄今,莫迪格里阿尼遗画展相继在纽约、洛杉矶、蒙特利尔、马德里等世界都会举办。2002年10月至2003年3月,巴黎卢森堡博物馆推出规模最大的一次名为“宽容天使”的莫迪格里阿尼作品回顾展,陈列逝者鲜为人知的肖像画和女性雕塑,在艺坛显示他的“情欲圣殿”。现时,巴黎美术馆再度以“莫迪格里阿尼、苏亭(Chain-Souffre)及蒙巴纳斯奇遇”的艺术历史氛围烘托出莫迪格里阿尼被私人收藏的百余幅珍稀画作,让观众见另一艺术洞天。

一迈进巴黎美术馆,观众便被莫迪格里阿尼《蓝衣小姐》《黄裳女》《白领艾勒维尔》《扇女》等一连串新展出的绘画所吸引。《蓝衣小姐》上,画家以纯一的细线条勾勒出淳朴的童贞,展现一颗人之初洁净的灵魂。《黄裳女》流溢出小姐儿长成少女后不尚浮华的恬静美,而《白领艾勒维尔》则令人联想到拉马丁名篇《湖》中的朱莉·查理,大诗人心目中的另一位“艾勒维尔”,那个“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多情女,一泓浪漫诗歌的灵泉。这群倩女芳容中,《扇女》可说是画家红颜知己尼娅·切绍夫斯卡的“玉照”,立体雕塑极强,纤巧的苗条身段和“有眼无珠”的奇幻风神将人引入飘忽不定的玄秘境界。莫迪格里阿尼特别倾心于描绘女性柔曼的魅力。他呈现的女子形象总是柳眉杏眼、樱桃小口、长颈细腰、瘦如黄花,仿佛弱不禁风,漫润于深邃忧郁之中。他于蒙马特尔的“法朗吉”画坊里痴心描绘这些离奇女子时,毕加索正在画《阿维依的烟花女》,二人风格迥异。其时,毕加索的西班牙先锋派追求极为时尚,但莫迪格里阿尼对之不以为然,更不屑效法矫揉造作的前卫,而抱守意大利锡耶纳派残缺的古典美,执意走自己的独木桥。巴

助人。可惜,1917年12月3日,莫迪格里阿尼首届画展开幕几小时后就被警方以“下流”、“有伤风化”的罪名查封,勒令停展。

逆境中,莫迪格里阿尼经俄罗斯雕刻家夏纳·奥尔洛夫介绍,跟美丽善良、“洁白如娜”的艺术学院学生让娜·艾布泰勒纳邂逅,二人一见倾心。让娜家境殷富,父母获悉女儿跟了一个“浪荡子”,还是个“穷途落魄的犹太人”,坚决要求她立即断绝这种“不名誉”的关系。让娜不屈服于双亲的压力,被家庭断了经济支助,宁愿跟情人蜗居陋室,相濡以沫。可是,莫迪格里阿尼旧习不改,经常在外喝得酩酊大醉,苏醒街头后步履蹒跚闯回家门,令让娜辛酸。一对欢喜冤家的争闹风波频起,成了蒙巴纳斯“蜂房”一伙游闲艺人的日常的谈资。

莫迪格里阿尼似天生就有自毁倾向,艺术始终不得志,灭世情绪日益加深,遂放任毒化身心,竟至卧床不起,于1920年1月24日被结核性脑膜炎夺走了生命,年仅35岁。其时,让娜·艾布泰勒纳缓缓走近灵床,欲哭无泪,一语未发悄然离去。她这时已怀有9个月身孕,回到居所,夜间趁来安慰她的兄弟不备,从六层楼背向跃窗坠楼自杀,为“莫迪”殉情,一时震惊邻里。这对苦命鸳鸯曾于1918年底生有一女,跟母亲同名,由莫迪格里阿尼在佛罗伦萨的姐姐扶养成人。此女长大为父作传,题为《莫迪格里阿尼,人与传说》。

确实,莫迪格里阿尼死后成了流布欧洲艺坛的神奇传说。巴黎市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索菲·柯莱斯女士说:“莫迪格里阿尼的生涯比他的艺术更出名,他实际上成了现代画坛的殉道者。”莫迪格里阿尼曾被保尔·岱勒梅称为“锡耶纳的天鹅”。他英年早逝,留下天鹅的绝唱,加之让娜·艾布泰勒纳为他毅然赴死,凝合成一段酸楚的传说,成为巴黎“美好时代”蒙巴纳斯国际文艺思潮泛起的凄婉映像。

正因为如此,“新浪潮”著名导演贝克尔于1958年将莫迪格里阿尼与让娜·艾布泰勒纳的感人爱情悲剧搬上银幕,由法国和意大利合拍电影《蒙巴纳斯19号》。这部电影中,法国公众最热爱的银幕明星、曾在《红与黑》里饰演于连·索黑尔的钱拉·菲利普特应邀加盟,扮演莫迪格里阿尼,芳龄26岁的青春女影星阿努克·艾梅饰让娜·艾布泰勒纳。二人表演契合得如水乳交融,汇成“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天穹星云。观此感人肺腑的经典镜头,人们不由地久久回想莫迪格里阿尼现实生活里临在病榻跟让娜执手相顾的时辰,拭拂心镜的俗尘,

目中闪烁着愤世的自豪,甘愿当他绘画、雕塑的资

域外传真

## 2012年德国巴赫曼文学奖 授予奥尔加·马蒂诺娃

□何宁



7月8日,历时三天的第36届“2012年德语文学日”终于在奥地利克拉根福落下了帷幕,而众所期待的英格博格·巴赫曼文学奖也尘埃落定。这一次,俄裔德国女作家奥尔加·马蒂诺娃(Olga Martynova)凭借《我将会说:“嗨!”》成为了这个重要的德语文学奖项的得主并获得了25000欧元的奖金。

英格博格·巴赫曼文学奖是德语文学领域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是奥地利克拉根福市为了纪念1926年在克拉根福出生的著名女作家英格博格·巴赫曼而出资设立的,首次颁发于1977年。而今年,共有14位作家参加了巴赫曼文学奖的角逐,他们分别为来自奥地利的伊莎贝拉·费穆尔、科内莉亚·特拉尼切克,出生在奥地利小城威尔斯、现居日本广岛的莱奥波德·费德迈尔、出生在奥地利利居瑞士的胡戈·拉姆内科;来自瑞士的西蒙·弗洛林、米亚姆·里希纳;来自德国的扎比内·哈辛格尔、丽莎·克雷茨茨、英格·玛利亚·马尔科、马蒂亚斯·赛克尔、安德里亚斯·施蒂希曼;出生在德国现居芬兰的斯特凡·莫斯特以及出生在俄罗斯现居德国的奥尔加·马蒂诺娃和出生在波兰现居德国和瑞士的马蒂亚斯·那瓦特。在7月6日至8日的三天时间里,这14位作家朗读了自己迄今尚未出版发表的作品供公众评判,竞争异常激烈,评委也是经过多轮投票后,才最终确定俄裔德国作家奥尔加·马蒂诺娃作为此次巴赫曼文学奖的得主,因为评委们认为她的作品是此次参赛作品中少数能够超越个人生活领域的作品之一。

奥尔加·马蒂诺娃1962年出生于俄罗斯的杜丁卡,1991年她离开俄罗斯来到德国,目前居住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奥尔加·马蒂诺娃既用俄语也用德语进行写作,自1999年起她开始为《时代》《法兰克福评论报》以及《新苏黎世日报》等知名报刊撰写文章。除此之外,她还出版过诗集、散文并且在2010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甚至鸚鵡也比我们活得长久》。在此次的参赛作品《我将会说:“嗨!”》中,奥尔加·马蒂诺娃描述了年轻的主人公莫里斯在叔叔罗伯特和婶婶阿尼塔家中度假时所经历的双重觉醒——诗学和性爱对他有着同样强烈的吸引力。他一方面被冷饮店的一个女店员深深吸引,而另一方面叔叔婶婶所在的小城历史也令他感到无比的兴奋。奥尔加·马蒂诺娃同时也用轻松和富于隐晦的幽默笔触描写了叔叔和婶婶之间矛盾重重的关系。评委们认为小说展现了一个诗人“经由性爱而诞生”的过程,称这部作品为“轻松、灵巧的画像”,并且对奥尔加·马蒂诺娃作品中所展现的“无政府主义的幽默”以及她作品中对“人类历史的领悟”大加赞叹。更加触动评委的是奥尔加在作品中对文化历史的富有艺术性和幽默感的穿插,在评委看来,这使她的作品超越个人主题,从而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另外一个值得提及的地方在于,巴赫曼文学奖并不是奥尔加·马蒂诺娃获得的第一个德语文学奖项。尽管她用德语写作的时间并不算很长,但她已经于2010年进入了德国图书奖的大名单以及ASPEKTE文学奖的小名单,并且于2011年获得了沙米索文学促进奖以及Roswita文学奖。因此,此次的巴赫曼文学奖只不过是对其文学创作做出了再一次的肯定。